

# 老人和家庭政策： 家庭關係的內涵 及含意之探討

～ 施教裕 ～

## 壹、緒言

自八〇年代以來，許多亞洲國家已認清人口成長率的降低和老年人口的增加無非是一個奢侈的負擔，蓋一旦老人問題成為公共政策議題時，則無論是政府或家庭二者均將被期待負擔起照顧老年成員的責任。然而近來此等國家家庭結構及型態的改變，卻產生老人是否仍將一如昔日的被尊敬和照顧的疑慮，尤其是在現代化社會裡，其它的社會變遷因素諸如都市化、人口遷徙、女性勞動參與率提昇等，可能導致家庭照顧老年功能減退或人力缺乏的問題。另一方面，有鑑於西方福利國家的沈重財政負擔以及福利服務供給多元化和社區化的發展趨勢，此等國家的決策者似又對政府在老人照顧角色的介入與否或多少，猶豫不決或裹足不前。

因此，現今亞洲國家在老人照顧問題上所必須考量的未來家庭政策方向及重點，如Martin（一九八八）指出主要有三個議題：（一）亞洲國家是否應援引西方的模式作為榜樣？（二）在照顧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方面，政府和家庭所應扮演角色為何或如何分工？（三）各種老年福利措施或照顧之提供對象資格究應基於年齡條件或需求之考量？顯然的，亞洲國家決策者並不想仿倣西方的模式，同時強調家庭照顧老人的責任，不過，西方的家庭政策內涵為何，或亞洲家庭未來是否有照顧老人的能力，以及政府介入是否意含鼓勵家庭放棄照顧老人的責任，或政府與家庭如何分工，乃至在各項老人福利措施上究竟採取普遍性或選擇性的原則等等，則仍有諸多爭議，此等議題亦乃本文所將討論的家庭政策課題。

因此，本文希望從老人家庭關係的相關理論之文獻回顧中，試圖釐清老



人家庭關係內涵及互動類型之概念基礎及架構，同時藉由目前國內老人的家庭關係之內涵及互動類型等經驗性研究資料，以檢討和建構適合當前國內老人狀況之家庭關係的理論及概念基礎，並作為討論上述三個議題的理論及事實依據，及進一步探討老人照顧措施的意義和家庭政策的意旨。

## 貳、老人家庭關係的理論及概念架構之回顧

國外對家庭關係在工業化和都市化社會中，由於核心家庭日增和家庭功能式微，是否因此導致家庭關係疏離，仍是爭議不斷的課題。早期如Parsons(1943)和Bott(1957)認為現代化社會中家庭關係將愈形疏離和家屬功能愈見薄弱，晚近如Sussman(1965,1976)、Shanas(1979)和Fischer(1984)則指出疏離的核心家庭是一種迷思，事實上老人和家屬之間的關係仍見相當頻仍。國內學者如謝繼昌(1982:255-280)對此亦認為，工業化和都市化並未破壞家庭外之父子親屬連帶，反而在某些方面有益見增強之趨勢。迄至目前國內外實證資料大多顯示老人和家屬之間的連帶並未中斷(Tornstam, 1992; 吳味鄉, 1993; 郭玉燕, 1993; 施教裕, 1994)。

老人和家屬之間的連帶，婚姻的連結是最親密的關係，因此與配偶之間的互動關係相當廣泛密集，以日常生活照顧而言，配偶乃是最主要的提供者，其次成年子女基於直系血親之連結關係，與老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亦相當重要，除了係金錢物質資助之主要供給來源外，在其他日常生活照顧的互動角色亦和配偶相去不遠(吳味鄉, 1993; 施教裕等, 1994)。國內兒子和媳婦的角色往往比女兒較為重要，此與傳統中國父系社會規範價值有關(林美容, 1983: 49-103)至於西方老人的家庭關係中則女兒比兒子或媳婦較為重要(Komarovsky, 1976)，此可能與西方社會家庭關係中女兒與父母之

間的感情較為親密所致。至於孫子女的角色，在現代老人的家庭關係中，則並不顯著(施教裕等, 一九九四)。由上述可知老人與家屬之關係主要係以婚姻和直系血親為基礎，不過基於父系社會價值的規範，兒子與媳婦比女兒的互動關係較為頻仍，以及祖父母與孫子女兩代之間的近似性和互賴性可能均嫌不足，故使老人與家屬之間的連結關係在成員互動對象上，仍有若干限制。

至何者為維繫老人家庭關係的基礎或要素，則相關的理論依據及詮釋，最早乃以Durkheim(1933)提出社會組織所賴以維繫的是社會連結(social solidarity)，並在分工愈細的未來社會中，將由簡單的機械連結(mechanical solidarity)發展為複雜的器官連結(organic solidarity)。不過Durkheim本身亦認為若欲達到社會凝聚(social cohesion)的境界，事實上亦需要機械連結和器官連結兩種機制的同時存在和配合。由於器官連結的概念乃更意含社會功能內在的整合，故Parsons(1955:3-33)進一步指出社會體系或家庭體系所賴以維繫的必要功能，若以家庭體系而言，一是滿足成員生理需要的基本功能，另一則是滿足成員社會性及情感性需要的輔助功能。其他學者(如Brown, 1965; Shaw, 1976:197)亦根據兩種連結的概念而衍生初級團體在整合上所憑藉的三個主要連結，即近似性(similarity)、互賴性(interdependence)和凝聚性(cohesion)。

早期的其他學者如Homan(1950:231, 242)由社會行為的基本要素之觀點，指出家庭關係之連結須由活動、互動、情感及規範四個層面加以界定，活動代表成員共同的活動項目及內涵，互動代表成員之間的相依互賴，情感代表成員相互接受或親近的感受，及規範代表成員彼此之間行為和互動方式的預期和準則。此外，上述四者在行為過程中有相互影響和互為因果之作用。Nyve and Rushing(1969:135-136)基於家庭整合的觀點認為家庭關係



是多層面的，至少包括六個要素：關連、情感、共識、互換、規範、目標，此六個要素又可歸納為三個概念，即關連整合、情感整合和共識整合。Bengtson et al.(1976:256)雖然反對上述三個代表家庭關係及整合的概念架構，認為此一概念架構過分強調其結構功能性的意涵，不過仍接受其作為檢視家庭互動關係的主要基準，Bengtson and Schrader(1982:116)並以上述六個要素作為探討親子關係的測量依據，同時強調此六個要素雖各有其獨特性但仍彼此關連，和進一步將家庭關係的概念架構重新界定為關連連結、互賴連結和規範連結三者，關連連結旨在瞭解成員互動的頻率和類型，互賴連結偏重交換功能的活動內涵，以及規範連結則顯示成員彼此之間共同期望。

後來的學者如Olson et al.(1983a:5-6, 1983b)則倡導雙元並行模式(Circumplex Model)，認為分析家庭關係的概念架構須同時考量凝聚性(cohesion)和適應性(adaptability)，故所謂整合、連結或凝聚的概念乃是一個連續性的尺度，在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繫帶與個人自主之間宜保持適當的平衡，也就是在串連(connectedness)與分離(separateness)之間的適當調適。藉此乃將家庭連結的尺度分為四個類型，即撤退、分離、串連和牽絆，認為分離和串連都是正常的，只有撤退和牽絆才是病態的。因此假定家庭連結尺度與其他家庭關係的測量指標之間的關係是弧型的，而非線性的，不過其他研究發現則似乎仍是線性的，而未能支持此一假定(Broderick, 1984)。

由上述解釋老人家庭關係的要素或基礎的相關理論，可以瞭解老人家庭關係之運作內涵及機制，均與維持家庭連結之基礎或家庭整合之目標有關。因此，由過去各種家庭關係的理論界定及概念架構看來，所謂家庭關係的連結內涵或運作機制，均與整合(integration)、連結(solidarity)和凝聚

(cohesion)等概念有關。至家庭整合或家庭連結、家庭凝聚若以近似性和互賴性為基礎，則其運作內涵及機制可以包括關連整合、情感整合和共識整合三個層面的概念架構，或概括關連連結、互賴連結和規範連結三個層面的概念架構，前一個概念架構似乎是較偏重於人際互動關係的事實和意義，後一個概念架構則似乎較強調家庭結構功能的要求和期許。為了突破上述兩種概念架構可能過度偏重於家庭結構功能之約束或人際互動關係之牽絆，而忽視個人自主和自我整合之需求和現實，故晚近學者大多對家庭關係整合的概念重新加以界定和賦予不同的詮釋，即家庭整合仍須兼顧家庭整合與個人自主(及自我整合)二者之間的調適和平衡。

因此，除非對家庭關係內涵及運作機制有規範性之期許外，如強調互賴性之運作基礎藉以維繫家庭結構之功能，或主張自主性之運作機制以保障個人自我整合之實踐，否則上述規範連結之意涵乃尊重家庭成員可以自行在互賴性與自主性二者之間做適當的抉擇，而不致於過度的撤退而撒手不管或過度牽絆而孤立無助。亦因此，在未來家庭結構組成和女性勞動市場參與之變遷趨勢下，近似性和自主性二者將逐漸取代互依性和整合性而成為家庭關係的主要內涵及運作機制，和作為訂定未來家庭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

又老人的家庭關係連結內涵及運作機制，若擴大其連結對象或運作範疇至家庭以外的非正式網絡(如其他親戚鄰友)和正式網絡(如市場和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則對原來的連結關係可能產生何種交互作用，亦是值得關注的課題。在相關理論基礎方面，若以老人照顧的來源而言，即有Cantor(一九七九)和Chapell(一九九一)所提出的「逐級替代模式(Hierarchical Compensatory Model)」(或簡稱替代模式)，此一模式的觀點乃認為老人的照顧對象來源，可能受到資源的可及性(availability)和可受性(acceptability)之影響，故一般而言，其首先選擇的對象是初級團體



中的家屬，如家屬無法供給時才向非正式網絡中的其他成員如親友鄰居求助，而至最後才向正式網絡中的市場或政府機構求助。

另一個模式即是Litwak(1985)和Wilcox and Taber(1991)晚近所建構「工作區分模式(Task-Specific Model)」(或簡稱分工模式)，認為不同連帶關係的團體成員可能提供不同性質的照顧內涵，而在整個照顧內涵的相關層面的結構上，有合理和週延的分工，如密集而又貼身的個人照顧諸如病痛看護和穿衣餵食、洗澡如廁等，乃由家屬提供；至一般偶爾又非近身照顧諸如交通接送、購物跑腿、訊息傳達和情感支持等，則由其他不同親密程度的親友鄰居分別提供。至於在目前國內老人照顧現況中，家屬與其他親戚鄰友之間的運作究竟係屬於替代模式或分工模式，乃至將來政府不得不介入後在家庭與政府二者之間的運作，究竟將產生替代模式或分工模式的後果，則均待更多的經驗性研究加以深入探討，俾作為家庭政策制定上如何規範政府與家庭之間的分工和責任之依據。

### 參、老人家庭關係內涵的經驗資料之借鏡

以國內老人居住方式而言，老人與子女同住者比例由七十五年的七十二·二%降至八〇年的六十二·九%，獨居者和僅與配偶同住者比例則由七十五年的二十五·五%增為八〇年的三十三·二%；若從老人與家人的接觸而言，則其與未同住的子女見面的頻率，在七十五年至八〇年之間並無顯著改變，其每天或每星期至少見一次面者的比例，均維持在二十五%至三〇%之間，和三個月以上才見一次面者的比例，均維持在二〇%至二十五%之間(行政院主計處，1992<7>、17>)。由此可見，過去幾年老人家庭結構及成員雖因居住安排方式之改變而已略有不同，即未與子女同住者增多，但家

屬之間的連繫關係，即使與未同住的子女之間如彼此見面的基本互動，則並未因居住安排的改變而有顯著的消長變化。

若進一步探討一般居家老人和家屬之間互動關係的內涵，在老人照顧方面，則發現在短期病痛的照顧上，配偶為主要提供者(三十一·四%)，其次為子女(包括女婿和媳婦)(二十九·四%)，其他親友鄰居甚少；在長期病痛的照顧上，子女為主要提供者(三十九·一%)，其次為配偶(三十五·八%)，其他親友鄰居甚少；在金錢支持上，子女為主要提供者(五十四%)，其次為配偶(八%)，其他親友鄰居甚少；在日常生活的照料上，如衣物換洗主要提供者為配偶(三〇·三%)，其次為子女(二十七·八%)，至如住家打掃、購物和交通接送等，主要照料者亦為子女(三十一·三%)，三十一·八%，三十四·九%)；其次為配偶(二十八·%，二十五·四%，七·八%)，其他親友鄰居亦甚少；至在閒聊慰藉的心理支持上，則以其他親友鄰居為主(四十四·〇%)，其次為配偶(三十二·%)和子女(十七·四%) (吳味鄉，一九九三)

由此可知一般居家老人的日常生活照顧，在與家屬互動的各種關係內涵上，除了閒聊慰藉乙項外，家屬仍是主要的連結對象，其他親友鄰居的互動十分有限。又在家屬中除了配偶外，兒子和媳婦的連結關係顯然比女兒和女婿較為重要，以及兒子在病痛照顧、金錢支持和交通接送等項目上亦比媳婦較為重要。上述家屬為國內一般居家老人照顧的主要提供者之發現，與國外多數相關研究結果相近(Stephens and Christianson, 1986)。不過媳婦比女兒的照顧角色較為重要之發現，則與西方國家研究結果不同(Komarovsky, 1976)。至於上述目前國內老人日常生活照顧內涵的型態及頻率，與過去老人的家庭關係內涵相形之下是否有所改變，則因無資料可資比較，故亦不得而知。



由於在非正式網絡中，一般居家老人的照顧來源或互動對象除了家屬之外，尚有其他親戚鄰友，不過在各種互動關係內涵中，除了閒聊慰藉之項外，其他親戚鄰友在老人照顧上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在吳味鄉(1993)進一步的邏輯迴歸分析中，除了有無配偶的變項之外，居住安排乃是決定老人是否接受其他親戚鄰友提供諸如病痛照顧、日常生活照料和交通接送等照顧之互動關係的顯著因素。可見未與子女同住之老人若無配偶可以提供照顧，則必需由其他親戚鄰友替代或補償原來由家屬所扮演的照顧角色和功能。此一發現與替代模式的觀點大致吻合，不過亦正如Chapman本身所反省此一模式似乎過度強調家屬關係的重要，而忽視其他親戚鄰友的角色。譬如其他親戚鄰友在閒聊慰藉的心理支持上即扮演獨特性供給者角色，此又與區分模式所主張不同連結關係的團體成員可能提供不同性質的照顧內涵之觀點，頗為相符。

由於上述非家屬的替代或補償作用似乎可以發生在不同性質的照顧內涵中，包括密集的病痛照顧和一般的家事照料，可見在老人互動關係的內涵及運作機制上，工作區分模式固然指出不同連結關係的團體成員可能傾向於維持其特定性質的互動關係內涵，不過一旦某種原來預期的特定團體成員之供給來源欠缺時，則替代作用即將產生，而與其他團體成員之互動關係作為補償。

其次，在台灣省公私立機構自費安養老人的人際關係之內涵及運作機制中，由於互動對象及關係網絡已由非正式網絡擴展至正式網絡，故其互動對象除了家屬及其他親戚鄰友之外，尚包括機構的工作人員和院友。若以老人所接受社會支持的內涵及來源而言，在金錢物質支持方面，仍以子女居多(平均數值二·二三，最高數值四·〇)，其次為親友(一·七二)和配偶(一·三七)，再次為院友和工作人員；在生活照料支持方面，以工作人員

(二·三五)和院友(二·一四)居多，其次為子女(一·九三)和親友(一·八三)；在訊息支持方面，亦以工作人員(二·二七)和院友(二·二六)居多，其次為親友(二·〇六)和子女(二·〇〇)；和在情感支持方面，仍以院友(二·四六)和工作人員(二·四四)居多，其次為親友(二·一五)子女(二·〇三)(郭玉燕，一九九三)。

可見老人即使在住進機構之後，其人際關係除了在金錢物質、生活照料、訊息和情感等方面，仍與家屬及親友維持相當的連結關係外，更擴展至機構內的工作人員及院友，此乃顯示老人家庭關係並不因住進機構而告中斷或疏離，甚至其人際關係更擴展到更大的正式網絡中。因此，若就子女仍為提供金錢物質之主要互動對象，和工作人員及院友為提供訊息支持和情感支持的主要互動關係對象而言，則前述工作區分模式之論點在此仍可獲得相當支持。不過一旦老人住進機構後，其生活照料支持的互動關係對象已由工作人員和院友就近替代，則似又佐證替代模式的論點。由此可見，即使是機構老人的家庭關係及人際關係的內涵，仍如工作區分模式所稱與特定團體成員維持一定的互動關係內涵，惟一旦某種原來預期的特定關係供給來源欠缺時，則有替代作用之產生，而就近以其他團體成員之互動關係作為補償。

再者，在退休老人家庭關係之互動內涵及運作機制的探討中，施教裕等(一九九四)發現一般連結活動項目的頻率，如老人與未共同居住之子女每週至少通一次電話者，占七十一·五%，和至少探望一次者占六十二·三%；以及與不論是否同住子女在近一個月內外出聚餐至少一次者，占五十五·八%；和近三個月內外出野餐或旅遊至少一次者，占五十三·五%，可見退休老人與家屬的連結活動，不管是否同住，仍見相當頻仍。又在退休老人家庭關係的互動類型上，從廣泛的與家屬之互動關係項目中，包括金錢物質協助、財務處理、家事協助、生活照料、商量事情、談心和照顧孫子女



等，經進一步因素分析結果發現，老人與家屬的互動關係中呈現三種不同類型，即老人協助其子女的金錢物質或生活照料、子女協助老人的金錢物質或生活照料、和老人與子女的相互溝通諮詢。上述三種互動類型中，只有訊息和談心的溝通是雙向的，即老人能與子女溝通者，其子女亦能與其溝通，反之亦然；至金錢物質和生活照料則是單向的，亦即退休老人的家庭關係若不是處於協助子女的地位，便是淪為接受子女協助的角色，換言之，退休老人的家庭關係角色倘非照顧者即是依賴者，而較少有退休老人與子女之間在金錢物質和生活照料上相互協助之互惠或交換情形。

在進一步探討退休老人的非正式網絡中的人際關係互動內涵及運作機制，尤其是在退休老人所接受日常生活照顧來源的多寡方面，經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一般生活照顧如交通接送、家事清掃和購物等的供給者來源，可分為家屬（包括配偶、兒子媳婦）和其他親友鄰居等兩種類型。又在進一步日常生活照顧來源的相關因素迴歸分析中，更發現除了年齡之外，未與子女同住之居住安排方式乃是解釋由其他親友鄰居提供一般生活照顧或密集生活照顧兩種類型之唯一顯著因素，以及自覺健康狀況較差是解釋由家屬提供一般生活照顧或密集生活照顧類型之唯一共同顯著因素。

綜合以上所述，一般居家老人或退休老人之家庭關係的內涵在一般連結活動上，即使未與子女同住，但彼此之間如電話問好、探視、聚餐、外出旅遊等，仍相當頻仍；甚至在進住機構之後與其子女之間，仍在金錢物質、生活照料、訊息和情感等方面，繼續獲得相當的支持，可見近似性乃不失為老人家庭關係的運作機制所賴以維繫的基礎。又老人人際關係內涵與非正式網絡特定成員互動上，亦呈現不同的類型，即在生活照顧內涵中，如病痛照顧、金錢物質、打掃洗衣、交通接送、跑腿購物等，家屬仍是主要供給者，至如閒聊慰藉心理支持則以其他親友鄰居為主要供給者，甚至老人在進住機

構之後金錢物質之主要供給者仍為子女，此乃顯示一方面老人互動關係來源因照顧內涵不同而有分工模式之取向，另一方面近似性可能仍是老人非正式網絡中人際關係運作機制的基礎。不過在照顧來源的相關因素則發現除年齡外，未與子女同住之居住方式乃是解釋由其他親戚鄰友提供照顧的唯一顯著因素，可見老人家庭關係之互動及運作機制，若未與子女同住則其原來與家屬互動關係的部分或多數內涵，可能由其他親戚鄰友替代或補償，此一替代現象在機構老人的社會支持網絡中亦可發現。至於在退休老人的互動關係內涵所呈現的三種類型，則顯示家庭結構性或工具性的功能如金錢物質或生活照料等，仍只是單向的，而非雙向的，可見老人家庭互動關係運作機制所賴以維繫的仍是近似性，而非互賴性，即使溝通諮詢的關係型態是雙向的，但仍可能只是近似性的擴散結果，而未能凸顯互賴性的基礎。

## 肆、老人家庭關係內涵在家庭政策上的意含

以政策的形式而言，家庭政策的內涵可包括外顯的方案措施和隱含的方案措施兩種，前者直接攸關家庭福祉之某些特定或一般性目標之達成，後者則無特定具體之干預目標，但對家庭福祉卻有間接影響後果(Kamerman & Kahan, 1978:3)。以政策的目標而言，家庭政策的標的對象由於家庭型態的多樣複雜，如獨居、與配偶同住、與子女居住、與其他親友居住、居住退休社區和進住機構等等，由於不同的對象有不同的需求，故政策目標和標的也可能是多元性的，而非單一性的，甚至家庭政策本身也可能是綜合性的，而非一致性的。如此乃使家庭政策的一般性討論可因缺乏共同焦點或交集，而益見困難。

過去家庭政策的討論趨勢，始於工業化社會收入分配和所得稅政策的相



關課題，如大家庭的扶養負擔和兒童生活津貼或家庭生活津貼等，繼而在人口轉型後延續所分配和生育率降低等相關的人口政策課題，和進而對工業化後社會家庭依賴成員的支持照顧（如老年、殘障和遺族等）之社會責任分工課題，以及最偏重於婦女處於家庭照顧供給者和勞動市場參與者之角色衝突等女性主義相關之不平等待遇課題。

以政策分析的觀點而言，家庭政策之目的乃為防範或解決當前多數家庭所遭遇家庭關係解組或成員照顧需求未獲得適當滿足的社會問題。準此而言，家庭政策乃屬於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手段或工具，由於政策本身之工具性質，故家庭政策內涵本身亦代表某種觀點、社會價值、社會狀況評估基準和社會服務。

所謂家庭政策代表某種觀點，乃指在當前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之下，決策者和社會大眾對家庭政策目標之期許以及此一目標作為達成鉅視社會環境之其他目標的角色和定位。譬如以家庭政策作為追求經濟成長或經濟穩定之輔助策略，和調節勞動市場供需不平衡之手段，藉以誘使婦女參與勞動市場以彌補勞動力不足，而繼續維持高度經濟成長，或鼓勵婦女退出勞動市場以緩和勞動力供給過剩，而加強維繫傳統家庭的照顧角色和功能。

所謂家庭政策代表社會價值，乃指上述家庭政策目標有諸多選擇或不同取向，故決策者和社會大眾所偏好整體社會之經濟成長的實質利益和婦女個人選擇彈性的生活方式之自主權益，而主張政府應該主動積極提供照顧及服務，以替代或補償現代核心家庭之角色和功能之不足；或偏向支持傳統家庭照顧角色及功能，而強調家屬有相互照顧之責任和義務，和反對各種政府介入家庭照顧老人或協助家屬照顧老人之承諾和做法。

所謂家庭政策代表社會狀況評估基準，乃指政策目標所揭櫫的家庭福祉之理想水準，無非反映與目前家庭狀況現實之間的差距，或過去其他相關政

策未能達到此一理想水準之不當。譬如國內老人獨自居住者日增和與子女共同居住者日減，復加上女性勞動參與率逐漸提高，乃令人質疑家庭是否可以如昔日一般的履行獨力照顧老人之角色和功能。或以目前國內老人福利供給不敷需求之現況差距而言，或以國內與國外老人福利供給之比較差距而言（施教裕，1993），無非均意含彼等無自顧能力老人及照顧此等老人之親屬的家庭福祉及個人福祉，並未能獲得適當的回應和重視。

至所謂家庭政策代表社會服務，則指政策內涵本身所包括藉以達成政策目標的各種計畫、方案及措施。譬如政策內涵所將推動的各種機構式、社區式和居家式的老人養護、安養、休養及服務等方案及措施，以及為落實執行此等方案措施所需要的行政組織、工作人員及經費財源之投入和配合等等。

若撇開上述老人家庭政策所依據或代表之觀點及社會價值的抉擇不談，在此開始進行當前國內老人家庭政策課題的討論，事實上其潛在的意含即決策者和社會大眾並不接受或不滿意目前國內家庭之型態、關係或角色功能之現況，而希望政府有所介入和試圖改變。不過，此一政策課題之討論首先可能引起的爭執焦點，即在於如緒言所述西方社會的家庭政策可否借鏡，或傳統的中國家庭角色和功能即可提供老人最好的照顧之政策議題。不致令人感到太意外的是，許多國人仍對西方的老人家庭政策持有自我防衛的心態。譬如老人福利法修正草案在行政院第一次審查時，即以不符合中國傳統家庭倫理和不宜抄襲西方模式為由被退回重新擬議。

不過正如 Martin（一九八八）所引述許多亞洲國家的決策者或老人福利服務工作者均對西方社會的老人照顧模式深不以為然，總覺得亞洲社會在許多方面儘管不如西方，但在照顧老人方面當不致不如人家，反而是「應該」有更好的做法；不過以外人旁觀者的實際深入瞭解卻發現，事實上亞洲社會對老人的照顧顯然是一幅「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寫照，甚至不乏老人被



疏忽或遺棄的景象。當然，無可諱言的是，即使西方社會除了北歐彼等福利國家過去對家庭的介入較為普遍和積極之外(Uttel, 1982)，其餘多數國家的老人家庭政策對政府是否介入家庭照顧老人的角色和功能，仍是爭議不休。亦因此所謂西方社會的家庭政策模式，其真正內涵仍是相當多元和分歧的，並不能一概而論。正因如此，故家庭政策的討論之前提並不在於是以西方社會的家庭政策為借鏡，而是當前國內是否確有老人家庭之社會問題的存在，且須待政府加以解決。否則此一議題的過度討論無非只是反映國人自我防衛的心理狀態，而非為求真正解決問題的反省和關注。

其次，倘若政府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則政府宜介入多少和政府與家庭之間如何分工兩項課題，乃是老人家庭政策的主要內涵。不過，往往最令人隱憂的政策議題是，一旦政府介入是否將導致老人家屬的撤退和撒手不管，使政府完全取代和肩負原來家庭照顧老人的重擔。若從前述家庭關係的理論及概念架構之回顧而言，未來老人家庭關係的維繫基礎主要在於近似性，而非互依性，可見老人與家屬之一般連結關係即使不致中斷，不過家庭功能可以提供照顧老人之條件及潛力卻已減弱或大不如昔。準此而言，雖政府的介入不免替代原來許多家庭所扮演照顧老人的角色和功能，但老人家庭關係本於近似性之基礎及機制，一方面政府事實上不可能完全取代家庭的角色和功能，另一方面老人家屬亦不致遺棄或疏離老人。以老人照顧之替代模式而言，政府介入固有部分替代和補償作用及後果，惟以老人照顧之分工模式而言，則家屬仍將保有其在某些獨特層面的照顧角色和功能。若從前述目前老人家庭關係內涵之經驗性資料分析而言，老人與其同住子女之間的連結關係仍相當頻仍，甚至住進自費安養機構後，院方工作人員和院友固然是生活照料的主要供給者，且取代大部分原來家庭照顧的角色和功能，不過來自於子女的各種社會支持卻未因此終結，且仍是金錢物質的主要來源。

再者，仍和上一個議題有關的是老人家庭政策或福利措施的適用對象，須是普遍性的或選擇性的，抑是針對年齡資格或需求條件的議題。此一議題和政府所擁有的有限社會資源之分配及運用有關。以老人需求乃包括經濟保障、醫療保健、教育休閒和社會參與等四個層面而言，在經濟保障方面，不管是採取基本年金或保險年金的形式，事實上均係朝強制性和普遍性的適用對象之目標而規畫，這已是國內外老年經濟保障措施上的共同發展趨勢(Schulz and Myles, 1990)：在醫療保健方面，如同經濟保障一般亦是朝普遍性強制性的方案而發展，甚至老人所迫切需要的長期照護措施亦逐漸如緊急傷病治療一樣納入給付項目範圍(施教裕，一九九三)。至於教育休閒和社會參與二者則因措施本身均係非強迫性的，或老人本身亦有選擇使用與否的權利，故原則上仍不限制其需求條件，而以普遍性的適用對象為考量，惟根據老人不同標的人口群之特質提供不同的服務內涵，以滿足其多元性和個別性的需求。

由上述三個政策議題的討論，可以發現政策取捨的爭議焦點實際上乃圍繞在非強制性的老人福利措施中政府與家庭之間如何分工的主要課題，從老人照顧的分工模式或替代模式之理論觀點以及相關經驗資料而言，雖然政府的介入在不同的老人照顧內涵各有分工或替代之後果，但其不同後果之關鍵乃在於老人家庭關係的維繫基礎及機制為何，而不在政府有否介入或介入多少之考量，即使是普遍性的介入，在使用者而言仍是選擇性的。故政府在財力負擔或資源分配方面的考量，可另從使用者付費或部分分擔等行政管理策略加以因應。此外，老人是依賴者的刻板印象，也須重新檢討，蓋大多數老人仍是可以生活自理，需要別人照顧者僅不到5%（行政院主計處，1992：A9），尤其是在退休老人中仍有一部分繼續扮演照顧家庭的供給者角色，且未同時接受子女相對的給予回饋性照顧。準此而言，一部分的老人仍是家



庭的資產，而非負債。另外，由於退休老人與子女之間的互動角色，除了談心諮商的情感支持是雙向的外，其他物質性和勞務性的支持顯然是單向的，即不是供給者，便是需求者，很少有互相依賴的類型，因此即使是普遍性的政府介入，不過由於本質上乃屬於非強制性的照顧及服務措施，故乃將有選擇性的僅被彼等需求者或依賴者所使用。甚至有十四·一%老人希望政府提供其參加社團活動或社會服務之機會（行政院主計處，1993：9），可見開發老人志願服務人力資源以服務老人之潛力亦不容忽視，使老人不僅是家庭的資產，且成為社會有用的資產。

儘管老人家庭政策本身有上述工具性之特質，但老人家庭政策絕不能淪為政府減少財政負擔、減少社會服務或推諉老人照顧責任之藉口，或只是因應經濟消長或不同勞動市場人力需求之配合手段，而忽視家庭福祉與家庭成員個人福祉之追求和促成。蓋即使在國外老人進住養護機構之前，家庭和非正式網絡事實上已提供許多照顧，並試圖延緩老人住進機構也有相當期間，故機構照顧並非表示家庭遺棄老人，而是別無其他選擇餘地的最後抉擇（Smallgan, 1985）。因此，政府介入的角色定位乃是協助或支持家庭或非正式網絡繼續扮演照顧老人的功能，否則如果政府不主動積極提供照顧老人之家屬所需要的支持和服務，則可能如國外研究（Johnson and Catalano, 1986: 646）所指出，一旦未能獲得適當的支持和分擔，照顧老人的家屬即將採取所謂「瀑布流散效應（cascade effect）」之策略，向其他各種非正式或正式照顧支持來源如其親友鄰居或市場及政府求援，以減輕其本身之照顧負擔，故畢竟政府最後仍是推脫不了協助照顧老人的責任。或一再向外求援未果，則照顧者本身亦將導致兩種後果，一是牽絆作用（*enmeshing mechanism*），即完全從原來社會網絡中撤退和孤立下來，而獨自與衰弱老人抱殘守缺和斯守到底，和另一是疏離作用（*distancing mechanism*），即有意或無

意疏忽老人之需要，或甚至虐待老人。凡此種種後果，乃意含老人及其照顧家屬均無法獲得適當的家庭福祉或個人福祉，尤其是老人照顧的品質亦毫無保障或理想水準可言。

因此，未來老人家庭政策中有關政府與家庭如何分工的課題之主要旨趣，並不在於家庭至少須承擔什麼或多少責任，而在於老人家庭成員包括老人及照顧老人家屬之個人福祉是否均可以得到適當的回應和尊重。姑且不論外在社會環境所可能給予家庭成員角色及功能之衝擊或影響，若以人生過程（*life course*）之觀點而言，事實上老人與家屬之關係乃立基於過去長期互動運作之型態及結果，故老人家庭關係之內涵及機制，亦很難奢望其在老年時或日常生活照顧有所依賴時，才特別強調家屬應該及時扮演照顧角色和功。換言之，老人家庭關係若在過去長期與家屬早已形成不良或疏離的互動關係，則很難期待其家屬在老人晚年或生活無法自顧時，突然改變其原來交惡的關係而心甘情願的承擔照顧老人的角色和責任。準此而言，若一味主張老人家庭關係之互賴功能，則無論是老年時期老少之間相互照顧的同時交換互動（如老人家幫忙帶孫子和看家，子女則提供金錢物質），或青壯時期照顧子女與老年時期由子女回饋照顧父母之間的人生週期交換互動，恐怕均有其限制和困難。

亦因此，老人家庭政策基於兼顧家庭整合和個人自主性二者之間的平衡，及不同家庭型態的個別調適類型，自須尊重及協助老人家庭成員有自行選擇不同居住安排方式，及維繫不同連結關係之權利，藉以支持老人家庭成員有彈性的生活方式和避免不平等的家庭角色關係之形成（如一味強求婦女扮演或履行照顧老人的角色），而確保家庭福祉和個人福祉均能獲得適當的保障和提昇。

綜合以上所述，老人家庭政策的理念依據乃是，未來的家庭關係將建立



於成員彼此之間長期相處或親情培養的近似性，遠勝過於家庭結構性或工具性照顧或扶持的互賴性；家庭政策的真正意義，乃為使家庭整合與個人自主二者之間獲得調適和平衡；家庭政策目標，乃在於兼顧家庭福祉和個人福祉之保障和提昇；家庭政策之執行策略，乃制定普遍性的老人福利服務制度及措施；和家庭政策的內涵，須包括連續完整性的老人照顧及服務，即涵括各種機構式、社區式、居家式的老人養護、安養、休養及服務等方案及措施。

## 伍、結語

現代家庭功能也許因工業化社會之變遷和衝擊而式微，不過迄至目前無論老人是否與子女同住，其家庭關係之連結活動並未中斷，且猶見相當頻仍。儘管如此，老人家庭關係之維繫的基礎及運作機制，已不再建立於過去家庭結構功能或人際關係網絡互賴性上，而是託附在家人親密情感和共同生活之近似性上。故今後老人家庭政策的旨趣，乃在於賦予維繫家庭關係之近似性基礎及連結，得以發展均衡的內涵意義和雙向的互動類型，即除一般性連結活動之外，更能加強情感和訊息兩方面連結之增進及提昇，而不只是一味強調家庭應該負擔照顧老人之責任或義務，或爭議須否重新要求家庭成員須履行物質和勞務的連結關係或交換功能。此外，老人家庭政策亦宜兼顧家庭整合與個人自主之間的調適和平衡，如此才能使家庭福祉和個人福祉皆獲得適當的回應和尊重。又為達到可以兼顧家庭福祉及個人福祉之提昇的家庭政策目標，其政策內涵對有關機構式、社區式、居家式老人養護、安養、休養及服務措施之前瞻和涵括，亦是不可或缺。

（本文曾於「家庭與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中宣讀，作者現任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行政院主計處 一九八二 家庭生活與社會環境意向調查。台北：行政院主計處；一九九二 台灣地區老人狀況調查報告。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吳味鄉 一九九三 台灣地區老人照顧與社會網絡關係之研究。嘉義：國立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美容 一九八三 「中國親屬結構：相對性、父系嗣系群與聯姻」，中央

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第五十五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郭玉燕 一九九三 機構老人生活滿意度與社會支持之研究——以台灣省仁愛之家自費安養老人為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施教裕 一九九三 「老人長期照護需求評估及對策探討」，王國羽主編，

社會安全問題之探討論文集，嘉義：中華民國社會福利學會，頁二六五—二八九。

施教裕、萬育維、沈淑芳、吳明儒 一九九四 建立退休公務人員養老制度之研究。台北：行政院研考會。

謝繼昌 一九八二 「中國家族研究的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乙種專刊，第十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 英文部分：



- Bengtson, V.L., Olander, E.B., Haddad, A.A.  
 1976 "The Generation Gap and Aging Family Members: Toward A Conceptual Model," In J.F. Gubrium(ed.), Time, Roles, and Self in Old Age.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Bengtson, V.L., & Schrader, S.S.  
 1982 "Parent-Child Relations," In D.J. Mangen and W.A. Peterson (eds.), Research Instruments in Social Gerontology, Vol. 2.  
 Bott, E.  
 1957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London: Tavistock.  
 Broderick, C.  
 1984 "Review of Families: What Makes Them Work?" J.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6(2), 501-502.  
 Brown, R.  
 1965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Chantor, M.B.  
 1979 "Neighbors and Friends: An Overlook Resource in the Informal Support System," Research on Aging, 1, 434-463.  
 Chappell,  
 1991 "Living Arrangement and Sources of Caregiving," J.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46(1), s1-8.  
 Durkheim, E.  
 193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A Society, translated by G. Simps-  
 on. New York: Free Press.  
 Fischer, C.S.  
 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Homan, G.C.  
 1950 The Human Group.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Johnson, C.L., & Catalano, D.J.  
 1986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Family Support to Impaired Elderly," In L.E. Troll(ed.), Family Issues in Current Gerontology. New York: Springer.  
 Kamerman, S.B., & Kahan, A.J.  
 1978 Family Policy: Governments and Families in Fourteen Count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omarovsky  
 1976 Blue-Collar Marriage. New York: Rainbow House.  
 Little, V.C.  
 1982 Open Care for the Aging: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  
 Litwak, E.  
 1985 Helping the Elderly: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Informal Networks and Formal Systems. New York: Guilford.  
 Martin, L.G.  
 1988 "Aging in Asia,"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 43 (4) S  
 99-113.  
 Nye, R., & Rushing, W.  
 1969 "Toward Family Measurement Research," In J. Hadden & E.



- Borgatta(eds.), *Marriage and Family*. Itasca, IL: F.E. Peacock.
- Olson, D., McCubbin, H., Barnes, H., Larsen, A., & Muxen, M.  
1983a *Families: What Makes Them Work*. Newbury Park, CA: Sage.
- Olson, D., Russell, C.S., & Sprenkle, D.H.  
1983b "Circumplex Mode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Systems, VI: Theoretical Update," *Family Process*, 22, 69-83.
- Parsons, T.  
1943 "The Kinship Systems of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1955 "The American Family: Its Relations to Personality and to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 Parsons & R.F. Bales (eds.),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New York: Free Press.
- Schulz, J. H. & Myles, J.  
1990 *Old Age Pension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R.H. Binstock & L. K. George(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Social Science*. (Third Edition). New York: The Academic Press. (Chap.21)
- Shanas, E.  
1979 "The Family as a Support System in Old Age," *The Gerontologist*, 19, -167-174.
- Shaw, M.  
1976 *Group Dyna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 Smallgan, M.E.
- 1985 "There Was Nothing Else to Do: Needs for Care Before Nursing Home Admission," *The Gerontologist*, 25(4), 364-369.
- Sussman, M.B.  
1965 "Relations of Adult Children with Their Par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Family: Gener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rentice-Hall.
- 1976 "The Family Life of Old People," In R. Binstock & E. Shanas (eds.), *Handbook of Aging and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Van Nostrand.
- Stephens, S.A. & Christianson, J.B.  
1986 *Informal Care of the Elderly*. Toronto: Health & Co. Toronto.
- 1992 *The Quo Vadis of Gerontology: On the Scientific Paradigm of Gerontology*. *The Gerontologist*, 32(3), 318-326.
- Wilcox, J.A. & Taber, M.A.  
1991 "Informal Helpers of Elderly Home Care Clients," *Social Work*, 16(4), 258-265.